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一日出版

當前論壇

★第二期目錄★

軸心的作風	張忠紋
北非戰爭結束後的歐洲局勢	謝德柏
中國經濟復員別論	謝德文
戰後和平與中國文化	蕭一山
外人內地雜居與國民風習	秦家菊
加強法幣	衛挺生
坐井觀天錄	劉英士

軸心的作風

張忠紋

南京圖書館藏

簡單的說，在過去，軸心的作風已歷過了兩個階段。(一)在戰爭尚未爆發前，儘量以欺騙，詭計，宣傳，離間與恫嚇種種手腕，以增強本身的力量，而削弱愛好和平國家的力量。七七事變以前的日本是如此作法。一九三九年夏季的德國與一九四〇年六月前的意大利也都是如此作法。(二)在戰爭業已爆發後，集中全力作戰，或企圖速戰速決，或採取閃擊方式。前者為日本，而後者為德意。速戰速決也好，閃擊方式也好；其目的都是在，企圖乘反侵略國家準備尚未充實，團結尚未堅固以前，即能在戰場上獲得決定的勝利。

上述軸心所採用的兩種作風，當然都是根據當日的環境與形勢而作的有計劃的步驟。在戰爭尚未爆發以前，一般民主國家因愛好和平，無意戰爭，以致常為軸心國家的欺騙，詭計，恫嚇等手腕所蒙蔽，而易流於姑息。且一般民主國家，在當日，團結尚未堅固，亦不能完全不受軸心國家的宣傳與離間的影響。然而欺騙的辦法終不可以為常，任何陰謀家均無法長久欺騙世人，因之而軸心國家終不得不圍窮而七首見。盧溝橋事變時，日本「所獻的奧圖」已窮。一九三九年九月初德國的七首亦見。

軸心的第一種作風相當成功而終於失敗以後，他們的聲譽面目已露。「八一三」以後，日本乃高唱速戰速決。四年多以後，日本所謂的「中國事變」迄未能如意解決，日本乃又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發動太平洋戰爭。其初意又何嘗不在乘美國準備尚未充實，英法方為本身的自由與獨立在歐洲從事奮鬥的期間，思一舉而驅出英美在西南太平洋方面的勢力。

德國於一九三九年九月初進攻波蘭，不數週而波蘭瓦解。一九四〇年四月四日德軍北指，丹麥挪威相繼淪陷。五月十日開始進攻西歐，比利時，盧森堡，荷蘭，以及法國或被征服，或自動請降。六月十日意大利正式參戰，滿意可以迅速收成成果。殊不知「英倫之戰」(八月至十月)迫使納粹望洋興歎。同年冬季與翌年春季，東南歐各國相繼屈服；南斯拉夫與希臘終亦不能久抗。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志高氣揚，於是乃發動對蘇戰爭，思統一歐陸，而後使英國坐困。一九四一年德國對蘇的攻勢，雖曾達三千八百英里，然終不能攻入莫斯科。史達林政權與紅軍保

未崩潰。「一九四二年德國對蘇聯南部的閃擊戰，至史城而遭退却力，攻圍將近三月而不能下。在此期間，英國的實力已大有增進，而美國則已參戰一年。假若蘇聯堅守史城的戰績表示德軍的力量已達「強弩之末」，則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七日美英軍在北非的登陸正象徵盟方的利刃「出於鞘」。

一九四二年四月的珊瑚海海戰，與嗣後的中途島洋面戰爭，以及八月間美軍在所羅門羣島的登陸，阻遏了日本在太平洋上的猛進。同年秋冬間的史城會戰粉碎了納粹最後一次的閃擊，美英軍在北非登陸以後，戰爭的形勢業已大變。為適應新的戰爭形勢，軸心國家乃不得不改採舊的作風。軸心國家新的作風是什麼？作者個人的看法認為，軸心國家的新作風可以下列數語概括，即鞏固防線，加強對於佔領地的榨取，並爭取時間。日本在遠東是如此；德意在歐洲也是如此。隨着時間與事變的進展，他們的這種作風，且日趨強化。在過去半年中，德意一面苦撐北非的殘局，一面努力加強歐陸的防守（尤其南歐的防守），一面強迫被征服國家的人民服役；其目的似都在如上所述。同樣的，在過去半年中，日本一面加強西南太平洋上各島的防禦力量，一面努力在俄滿、華北、華中，以及泰越各地從事榨取；其目的亦在如上所述。

最近東條赴南京，赴長春，現又赴北平，凡此都表示東京已改採懷柔政策。前此暴力之所不能榨取，或不能順利榨取者，東京想改以懷柔政策取之。同樣的，最近歐洲軸心附屬國家的領袖，接二連三的造訪柏林，與希特勒會商。且報載，除討論防禦歐洲的問題外，兼論及軸心所謂的「歐洲新秩序」。這也充分表示德國對被征服國家也正在改採懷柔的政策。風聞，希氏於史城會戰以後，即已放棄了大元帥的職權，而集中精力於政治與潛艇戰的問題。此中的含義，都可以說明作者上述的觀點，即以懷柔政策加強對於佔領地的榨取，以潛艇戰法延遲或削減盟國的攻勢，因之而爭取時間。日本最近也在澳洲的北方集中多數潛艇，其作風似與納粹同出一轍。

如上所述，德日兩國的懷柔政策，並非表示他們統制力量業已增強，而實表示他們的處境已較前大難。這是與他們實力不足，想鞏固防線，加強榨取並爭時間的政策相配合的。無論德日兩國中的任何一國，盟方若能不給予以休養開養的時間，迅速對之進攻，大量與以破壞，則德日兩國現時的作風勢必又將失敗。這一次的作風失敗以後，軸心國家將無改採任何其他作風的可能與機會。作者相信，軸心第三次（即現時）的作風失敗之時，即盟國獲得最後勝利之日。

三十二年五月八日於重慶

北非戰爭結束後的歐洲局勢

龔德柏

一 北非戰爭已完全結束，軸心軍艦全部投降，逃脫者為數甚少。這一勝利所解決的人數，雖不甚多，但其影響，則非常之大。這猶如一九四〇年六月德國解決法國一樣，去了一個大敵，以後可以安心在他處作戰，而因北非之肅清，有北非之空軍保護，盟國船舶可以暢行地中海無阻，更要增加盟國在地中海與中東遠東的作戰力量。

二 意無點，我現在就此問題略為討論：世人從前高唱歐洲第二戰場，在理論上，固無問題。而在事實上，北非未肅清，德軍有隨時出中東的可能。倘英美在北歐或西歐開第二戰場，德軍利用其防禦工事，以少數兵力應付，而以大軍由北非直衝蘇彝士運河，向中東猛擊，將使大英帝國受制命打擊，而延長戰爭三數年。所以在北非未解決前，開闢歐洲第二戰場，是不可能的。

三 北非肅清後，盟國將怎樣動作，軸心又將怎樣應付，實為世人注

北非解決後，英國在英倫三島以外之其他部分，已無危險，（印度有充分力量亦無煩惱）若仍按兵不動，而不開闢第二戰場，那末，是不為也，非不說也，所以今後歐洲第二戰場，已成實際問題了，英國雖要瞻顧徘徊，美國一定不願允。

第二戰場既是要開闢，那末，在什麼地方開闢？何時開闢？都經研究。

第二戰場有兩個很可能的地方，一個是意大利；一個是巴爾幹半島。

第一由意大利開闢第二戰場，在目前是比較便利的。因為由突尼西亞到西西里島，不到一百英里，（由馬爾他島到西西里更近）到撒丁島也不過百餘英里。這兩個島尤其西西里，尚多少阻礙地中海交通，盟國亦有攻佔之必要。既然比較容易攻佔，所以今後當然是進攻西西里，或撒丁島也同時進攻。再進一步，就是克復法國德意大利疆土的科西嘉島。

這三個島嶼攻佔後，意大利全圖已完全暴露，在盟國空軍威脅之下，意大利任何地點，都在二百英里內外之距離內，盟國空軍可以任意出擊，意人必致寢食不安。從前英美由遠距離轟炸，意大利全圖已不能安心工作，許多人都向山地逃避。將來距離既近，轟炸次數愈多，而德意飛機又為數不多，在這種情形下，意國必然動搖，即令由德軍防禦，其抵抗力亦不會很強，盟國向意大利半島登陸，所遇抵抗與所付犧牲，不會很大。只要在陸上能站住地，軸心軍隊是不能抵抗的，戰爭一定順利進行。

其次意大利雖不濟事，但在德國各附庸中，他總還是佔第一把交椅。而德國內反戰爭的空氣，也相當濃厚；人民對於法西斯黨徒，概抱不滿；而自開戰以來，意軍總是敗仗，士氣已降到冰點以下，意國本有先期投降之可能，但以德軍的壓迫，無法達到目的，若盟軍在意大利登陸，很有促成意大利內潰的可能。若意大利先投降，在戰鬥力上雖無若干重要關係，但在政治上，地輿上，則影響甚大，勢必使巴爾幹各附庸國相繼投降；而被佔領各國，亦當更猛烈反抗，以爭取自由。

那末，盟國打倒德國，更容易為力了。試看意大利鑑於形勢之變遷，已由六人組織國防委員會，而前陸軍總司令巴多格利奧，已被任為陸軍指揮。巴將軍素意王親信，素不滿意於墨索里尼，以他任南線軍指揮，已有充分與盟軍合作，向中歐進軍之可能。墨索里尼對此竟敢同意，當然可視為意國內部情形非如此不可，是意國已到快投降的地步。盟國對於這種形勢，決不輕易放過。所以在政略上，盟國也有在意大利開闢第二戰場的必要。

但意大利北部，由亞爾卑斯山脈與德國接壤，盟國攻佔意大利，殆不成問題，惟是否由意國攻入德境，不無疑問。但我以為若德境有堅強之門志，又得此天險之地勢，誠然不容易進攻。而在目前失去門志的情形下，未必能阻止盟國攻入德境。況且盟國攻佔意大利後，在巴爾幹半島開闢戰場，更為容易，由巴爾幹攻入德境，則無問題。所以盟國在政略上，似均有在意大利開闢第二戰場之必要！

其次為由巴爾幹開闢第二戰場。本來巴爾幹半島，為進攻北歐之道路，上次戰爭，聯合國即係以薩羅尼加為據點，向北進攻，卒促成德與同盟的崩潰，而獲得最後勝利。這次取同一方向，對德進攻，當然可能。並且土耳其為英國的同盟，與美亦有充分之諒解，由土耳其向希臘或保加利亞進攻，英美軍隊可免前線登陸之犧牲。惟盟國關於該問題似尚有未同意者，是否無阻礙，不無問題。而土耳其是重願參加戰爭，亦為未定之數。若土耳其不願參加戰爭，則直接在希臘領土開闢戰場，須通過愛琴海，不但有意國潛艦威脅，而希臘各地之德國空軍，尤嚴重威脅盟國之運輸船隻，其損失或相當重大。所以在巴爾幹開闢第二戰場，其確實性似較意大利為小。惟如上文所述，若意大利攻克後，再在巴爾幹開闢戰場，則其阻礙已相當減少，或者事實竟這樣發展，亦未可知。

除意大利與巴爾幹外，由法國南部海岸，亦有開闢戰場之可能。但這種作法，雖容易解放法國，而進攻柏林，則殊不易。因為其間有法國的馬奇諾防線，可以移轉砲口向西，以阻盟軍東進；而齊格弗防線，則更難突破。所以這種第二戰場，其可能性應列在第三了。

此外在北歐開闢戰場，亦非不可能。或者在南歐開闢第二第三戰場，把德國力量分散，再在北歐開闢第四戰場，一舉而解決德國，亦非不可想像之事。

盟國在歐洲開闢戰場，似無疑問，惟何時開闢。則頗難推測。照道理說：是愈快愈好。但事實上，因軍隊之調動，或者政治上尚無問題，似無在一二個月內實現之可能。但有一點，則豫料其實現甚早，即進攻西里西亞。因為該島之進攻，於保護地中海航路，有重大關係，所以盟國當提前解決。該島攻佔後，方能在意大利或巴爾幹登陸。

以上是說盟國可能的行動，而德國方面如何應付，亦殊有討論之價值。原來德國靠北非這支軍隊，擋住盟軍，延長開闢歐洲第二戰場之期，以便集中軍隊，對蘇來一個三次進攻。並且東方約好日本進攻，希望在蘇得到決定的勝利，然後以政治手腕，阻止歐洲第二戰場之開闢，而解決戰局。但北非這支軍隊，並未達到任務，即被盟軍全部投降了。這一下却給希特勒一嚴重打擊，使他陷於極困難的地位。但我相信：希特勒不會放棄其對蘇進攻計劃。因為這是希特勒最後的一張牌；並且好容易弄得日本答應上鉤，若放棄進攻蘇聯的計劃，日本也必藉口不幹，德國以後只有防守，而無進攻的可能。侵略國家沒有連續勝利，即沒有前途，而勝利則需要猛烈進攻，方能獲得。防禦則為失敗之宣告，雖要苟延殘喘，亦不可能。

我們要知道防禦一定失敗，並且很快的失敗，則這次突尼西亞最後之戰，可以證明。隆美爾的非洲軍團，是德軍精銳中之精銳，他們是隆美爾由德軍中挑選出來的，並受過很好的訓練。這部分軍隊較目前任何德軍為強，殊無絲毫疑問。他們雖由埃及敗退一千七八百英里，但實力並沒有多大損失，後面既可以源源補充，又有極優越的地勢，以為根據。尤其比塞大港，是有名的軍港，戰前法國人建有強固的要塞，若要拚命防守，即比塞大一港，大概可支持一年，全部突尼西亞，當然更要支持若干時，但這個優越據點，很快就全部喪失了。尤其盟軍發動最後攻勢後，三十六小時，推進二十三英里，與一九四〇

年五月德國的閃電戰同一樣的遠度，德國放棄比塞大後兩小時，美軍始發現，才進而佔領，足見德軍並未實行抵抗，即放棄這樣優越的據點！

德軍何以這樣容易放棄優越據點，最大原因，當然是士氣的頹喪，據路透社十一日阿爾及爾電：從被俘德軍身上搜獲之文件中，得悉北非德軍在崩潰前士氣之頹喪。一九四三年四月愛特少將所發表之命令中，有下列數段：「若干軍官在緊要關頭，根本未能貫徹命令，若干部隊長官，作戰未能盡力，其名字皆已查出」。又稱，投降為可恥之行為，吾人將對其家族報復，並於戰後對其本人施行報復云云。我們由這文件中，得悉德軍門志已完全喪失了。他們一心一意只設法找尋投降的機會，雖告訴他戰後要報復，他們也毫不顧慮。因為他們都知道希特勒及其黨徒，活不到戰後，何能施行報復。所以他們整軍投降，連總司令阿倫上將也在內，我相信說要報復的愛特少將恐怕也在內。這證明德軍士氣整個的崩潰！

北非士氣整個崩潰，這樣經過挑選的精銳部隊的士氣還崩潰了，其他德軍士氣，難道不崩潰嗎？況且由史達林格勒起，德軍整個投降，已是開始崩潰。又經過北非的慘敗，更不知士氣要如何頹喪？以這樣崩潰了的士氣，要他們在歐洲大陸改取守勢，恐怕一遇盟軍進攻，就只有撤退或投降。這種情形，難道希特勒不明白嗎？所以我相信希特勒還是要取攻勢，以挽回士氣與國運！

今後希特勒還是照預定計劃，與日本夾攻蘇聯，既可以策勵其已頹喪的士氣，若稍得勝，可以恢復士氣至某種程度。若得到決定的勝利，可以「打倒赤化」為藉口，對英美要求議和，以便他完成「打倒赤化」之功。這雖是妄想，但在希特勒只有這種妄想，此外只有等死了！希特勒今後很可能繼續攻蘇，不顧盟國如何動作，若希特勒果然攻蘇，盟國在歐陸開闢第二戰場的阻礙更小，而在巴爾幹開闢戰場的阻礙亦消失。那末，在巴爾幹開闢戰場的可能性，又較意大利為大了。並且在兩面夾攻之下，解決德國更為容易。所以我相信歐洲戰場，今年內可以結束。

中國經濟復員別論

周憲文

近一年來，我很少執筆爲文，半因僻居閩北，孤陋寡聞，半亦不願「人云亦云」，災梨禍棗，茲以友人索稿急，擬對經濟復員問題，提出一點感想，就教於國內大雅，題爲別論，表示這是個人的私見，其實也許人家早已說過，那就更加證明了我的「孤陋寡聞」。

最近報紙帶給讀者一個令人興奮的好消息，說今年是復員年，各方面都在討論並研究復員的原則與計劃。本來人世間沒有不散的筵席，因七七事變的星星之火而成燎原的世界大屠殺實在也快到可以結束的時候。這幾月來，德國在蘇聯與北非的慘敗固可證明軸心首領已經走向下城，而日寇又復到處蹙羽，更可證明中國的最後勝利，即在目前。爲了未雨綢繆，照理現在應該多多討論復員的原則。細細研究復員的計劃。

說到復員，這應爲動員的對稱。因爲現代的國際戰爭是國家與國家間所有人力，物力，財力的總決戰，所以戰事一旦爆發，交戰國勢必動員一切力量，以爭勝利，戰事結束以後，當然要使因戰事而動員的人力，物力，財力復歸常態，沒有動員，就不會有復員，此爲「理之當然」。戰前既經動員，戰後自須復員，這也是「勢所必然」。不過中國這一次的抗戰，關於軍事及其他方面，因太外行，我不敢說，關於經濟復員問題，我有一點膚淺的感想：

第一，中國抗戰到現在已近整整的六年，國家總動員法的頒布，也已一年多，但是我們的經濟動員，到底到了如何程度實在是個疑問。雖如陳豹隱先生所說：「如果有人拿國家總動員法尚未完畢的理由來譏笑復員問題的討論，那雖似乎俏皮其實是不當之論」（見陳著中國經濟復員計劃應有的原則）不過，因爲我的偏見認爲復員是復所動之員，「員既未動復從何來」？

目前我們經濟動員的程度既極有限，則戰後經濟復員的問題應該

也就不甚嚴重。現在討論討論復員的原則則可，要計劃如何復員，那就難於着手。

第二，也許有人說六年來的戰事，已使我們的國民經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例如目前物價的高漲，這顯然是戰時的變態，戰事一旦結束，自應使其復原。再如淪陷區域，久經敵人的破壞與剝削，戰事一旦結束，也急待救濟與重建，但我以爲這些都與復員問題，無甚關係。因爲戰時物價的高漲，既非由於人爲的動員，則如何穩定戰後的物價，也就不是經濟復員，而是另一問題。至於救濟與重建淪陷區域，這些都是經濟復興，而非經濟復員。比方說，去年的東浙事變，敵人毀壞了我們的浙贛鐵路，我們在抗戰勝利以後，自須計劃重建，但這工作，在我看來是復興不是復員。

第三，當然六年來的抗戰，我們的經濟動員，雖然尚在推進時期，未曾收到多大的效果，但是我們也不能抹殺六年來的許多事蹟。例如經濟部主持下沿江沿海工廠的內遷，就是最顯著的二件；戰事結束以後，對於這些工廠的處置，應該是十足的復員問題。但我認爲今後處置這些工廠的目標，既不是地域上的復員，由後方搬回沿江沿海，也不是生產的復原，由戰時生產回到平時生產。言之，我們今後必須依據整個的建設計劃，決定這些工廠的地域分配，並使加緊生產以應戰後需要，我且相信，今後這些工廠的生產能力，一定比今天有過之無不及。因之我認爲這是經濟建設的問題，與經濟復員無關，因爲建設是積極的，復員是消極的。

第四，個人決不否認各經濟主管部門在這抗戰期內，曾經做了許多偉大的戰時工作，例如財政部直接稅制的推進，專賣事業的推行，對於戰時財政，不無補益，在某種意義上，也未始不是一種有效的經濟動員。但我以爲中國這一次的抗戰是與外國一般的戰爭不同，外國

既長戰爭，我們是切戰與建國經濟下，故如直接稅制的推進，專賣專業的推行，與其說是抗戰的工作，不如說是建國的設施。因此，我又認為這一類的事業，不但不應隨戰事的結束而「復員」，在戰事結束以後，反應積極繼續推行。

總而言之，我認爲外國的戰爭祇是戰爭，他們爲了戰爭而動員的經濟，在戰後自須復員。而其復員的主要工作，應該是使那些在戰時改造爲軍需工業的民生工業復歸常態。此外則爲一些復興與整理的工。至於我們中國，一方面因爲各種條件的欠缺，致使經濟動員變成具文，故在戰後我們也就失去了外國經濟復員的最主要工作。另一方面，因爲我們的抗戰，同時也就是建國，而且這種建國偉業，在戰事結束以後，尤須積極推進，故在戰後，中國祇有在建國的偉大計劃之

戰後和平與中國文化

自從大西洋憲章頒布和卡薩布蘭卡會議以後，世界人士都熱心探討將來的戰後和平問題。我國輿論之間發表的偉論尤多，大致均以我國有和平的素質，無侵略的野心，倘能本公平互惠之原則，俟各民族間獨立自由之基礎，則世界大同，不難實現。否則，人類慘禍，將仍不可避免。這是頗獲不確的論理，毫無可非議的。不過我覺得理論不難，想達成此理論之目的爲難，歐戰世界潮流，人類天性，似尙不容樂觀。蓋世界人類，均不能無自私正忌之心，惟自私則只有本身的立場，而無世界的立場，惟互忌則只有妨害的觀念，而無愛助的觀念。怎樣方能打破自私互忌之心，使人類相助而不相戕？這是討論戰後和平的先決問題，願於此有所申說：

(一)

美國耶魯大學教授斯派克曼著世界政治中美國的國策一書，主張美國應該站在現實主義的立場，及早爲自己打算，日本敗後，仍須與

下，從事整理與建設。整理固然不是復員，倘是如戰後整理今日的貨幣，我們就不能拿這種工作當作經濟復員，何況我們還要建設。我們不但講不到復員，我們還得繼續動員。我們仍繼續動員來完成建國大業。

因此在勝利在望的今日，我們應該多多討論中國戰後經濟建設的原則，細細研究中國戰後經濟建設的計劃，並在戰後，繼續經濟動員，來完成這一偉大的建國工作。

末了，我還補充一句，我不是說中國在戰後完全沒有經濟復員的問題，例如田賦徵實應否仍舊改爲徵幣，即其一端，我祇說經濟復員問題在中國不重要，重要的是經濟建設問題。

蕭一山

之提攜，以牽制中國。這固然是他一人私意，未必能代表美國的國策，但自少可以代表世界思潮和人類天性中尙有此暗礁，誰能不爲其已打算？說穿了也無怪稀奇。我們若就人類的立場而論，應該設法將那些暗礁除去，另樹立一種「慈航普渡」的指標，獨立自由平等博愛，這都是古今人「慈航普渡」的指標，但暗礁不除，仍只可「望洋興歎」而已。如欲除去此種暗礁，則必須先從哲學宗教入手，換句話說：這是一個文化的問題，而不是政治經濟或法律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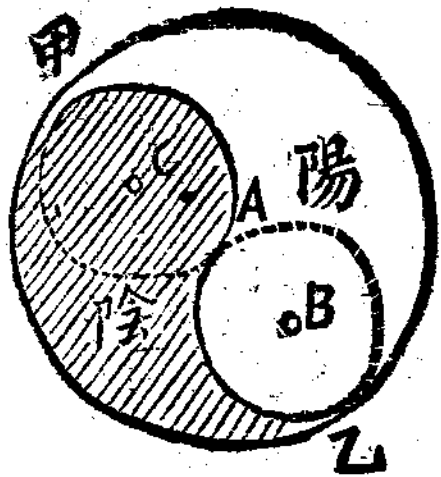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歐洲人於於戰禍之慘烈，曾經一度風靡過人類互助的哲理，感爾遜的建議，雖告失敗，但全世界都認爲他和平的願望。華沙銘發表一篇中國哲學的論文，德國人表示無限的歡迎，痛定思痛，這也是當然的。不料曾幾何時，莫索畢尼希特勒國策正及無數的魔鬼出來攪亂了世界，使東亞野蠻殘門之墳地，這是甚麼原故呢？實在說起來，這還是人類天性中的暗礁在作祟。人類之無善惡，人類之習有野惡，所以宋哲王張「變化氣質」，「明心見性

，因為先天的本性之明，常被後天的習染所蔽，要掃除這些由情慾而起的不正的習染，然後方能鍛鍊得如精金鑄鋼一般，所謂「變化氣質」者在此。德國人從菲希特講演以來，它們的學風和立國精神都是以民族自尊為出發點，會挽回了頹廢的國運，戰勝了強大的法國，但高傲堅忍，蔑視一切，造成了現在希特勒的侵略狂，造成了日耳曼的統制慾，義大利是羅馬帝國的後裔，莫索里尼怎麼不想效法凱撒呢？日本假造的始祖曰神武天皇，其崇拜武力可想。所謂「武士道」，「大和魂」也者，都不外好勇鬥狠之風，那裏有什麼文化？我嘗同一個日本的有名學者開玩笑說：「自古以來中國重文輕武，故中國有文化；日本重武輕文，故日本無文化而有武化，西洋重物輕人，故西洋直可謂之物化」。這雖是一時的笑談，然而軸心三處的「然虎馮河，死而無悔」的價值，在中國是絕對找不出來的。因為好勇鬥狠的子路，不是孔子的嫡傳，孔子還說：「野哉由也」，「不得其死然」。孔子是中國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創造者，他的教化是道德仁義，而不是怪力亂神。他集老墨法三家之大成，他創造了辯證的中庸文化。這個中學應當作「正」之「反」之「合」解，不應當作折中解。最近死去的佛學大師歐陽竟无先生說：「真孔以狂狷為中庸，偽儒以鄉愿為中庸，真孔中庸，還我實落，偽儒中庸，但有華言」。這真是味道有得之語。孔子說：「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就是把兩極的本體而為之貫通，絕不「執一」以害事，因為「兩端」仍是「一體」，循環往復，久無不歸，只有把握兩端，持其中心，因時利導，因勢利用，才可以歷久而常新，不至於矯枉而過正，所以一部易經「叫物成務，貫天下之道」者，總不外陰陽剛柔互濟之理。老子主「靜虛無為」是柔道，法家主「循名責實信賞必罰」是剛道，墨子主「兼愛節用」不侈於後世，不墮於萬物，不卑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似乎剛柔皆有，但又驚外逐末，違乎人情，所以孔子兼取三家，以成中庸，任者自狂，獨者自狷，苟已正名，循循樂樂，才建立了偉大的中庸文化，才造成了偉大的中國國民性。

(11)

為什麼說中庸文化是辯證的？因為宇宙間事物，只有一個具體的兩方面一端，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這兩方面不用什麼辯證來形容，都各有其定性 *Definiteness*，各有其道理，各成其內在矛盾發展之定律，這種自動發展的歷程，不是單純的循環，而是綜合的變化，這就是辯證法的「否定之否定律」。否定之否定是合題而不是正題，是新的階段之構成，而不是舊的原狀之恢復。但合題又為另一矛盾歷程之正題，由內在的矛盾而發生反題，則又必趨於另一個合題！如此往復而不息。孔子以一個「誠」代表事物的整體，「一」猶之乎人格兒所說的概念，馬克思所說的物質，他說：「誠者物之終始」，「合內外之道也」。中庸說：「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故時措之宜也。」這是合精神物質兩方面而言的，較黑格兒馬克思更進一步了。至於誠的變化之定律，則孔子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之至誠則能化」。一共有七個階段。其實誠是體之合題，形著明是正題，動變是反題，化又是合題。易經說「一陰一陽謂之道，一闢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中庸說：「至誠不息則久，久則微，微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這和黑格兒辯證思維法所說：認識事物整理，永遠在運動中的基本觀點有什麼區別？黑格兒說：「不變動的，不發展的事物，是不可思議的。」孔子則說：「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也是一樣的意思麼？至於辯證法的第二個基本規律是「數變質變數」孔子也常常的有所說明。中庸以天地山水為喻，謂「一孔之啜，一撮之土，一卷之石，一勺之水，並不算什麼，及其無窮寬厚廣大不測的時候，則萬物覆載，其藏財貨與殖焉。俗語云：『積非成是』，『否極泰來』，『樂極生悲』，『飲食養人多則害人』，似此變量變質之旨，真是更僕難數了。辯證法的最基本之「對立一致律」，即所謂「矛盾的統一」，和中庸的這種極端相合，故孔子以狂狷而得中行，以「執兩用中」而能動善應。

其論政則兼黃老名法之長，其論學則兼體用聖王之妙。無處不表示他綜合的一貫精神。中庸說「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也就是孔子之所以為大，也就是中庸文化之所以為大也。孔子理論的根據，一本於天象地形，用近代話來解釋，就是從自然界觀察體會得來的。易經一再反復述其義，故易賁卦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繫辭云：「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所以「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其對於事物變動的理則，則謂「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所以「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這就是說：聖人發現了事物發展之總規律，（即自然和社會之辯證法）要「舉而錯之天下之民，」使人人人都能瞭解推行，以成其本「性」以「安土敦仁」。



太極圖的圓周代表事物的整體，兩儀（如圖甲乙）代表事物的兩端，必兩端相合而整體始成。然而構成此整體者，絕不是兩個半圓的平直之拼合，乃是兩個小圓的邊緣之結合線，這個內在的結合是兩儀形

就象易經兩個字的意義，用近代話來解釋吧：易變也，經常也，法也。也就是辯證法的意思，這種理則，看起來好像很複雜難懂，若抓着了頭緒也很簡而易。今再借原始的太極圖為例，來說明兩端互執，中庸相成的道理：

而不是一直線，這就等於黑格爾所說的「結線」，Zosell's line。說事物發展，不是光滑的，發展之線線上存在着許多的結頭。結頭是兩個小圓的兩端之會合點，也是合成大圓體的中心點，（如圖A）小圓代表質的變化，弧線代表數的變化，數是突變的，質是漸變的。B小圓為正，則C小圓為反，大圓即為合。然而小圓之中，又各有其正反合焉。再從大圓的整體來觀察，陰陽兩面，互為消長，盈於此者消於彼，進於彼者退於此，易言：「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相推變化，就像兩弧線之逐漸進退，如圖以陽為剛為晝，以陰為柔為夜，則陽漸盛而陰漸衰，陰漸盛而陽漸衰，晝漸盛而夜漸衰，一陰一陽，一剛一柔，一晝一夜，合為一體，變化無窮。原因是內有內在的矛盾之「自動」律在。易繫辭言：「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這把辯證的道理，說得明明白白，日月生明，寒暑成歲，殊途同歸，是為矛盾的統一，——即對立之一致律。往屈來信，則為數與質的變化，相合而生「中庸」之利用。所以才成為「窮神知化」之「盛德」。舉例言之：如東半球為晝，則西半球為夜，晝夜推移，合而為地球「自動」的發展之一日。「如日中天」，就是陰陽兩端的結頭處，也就是大圓的中心點，所謂「極則衰」矣。如果能知道漸變的法則，也就知道「履霜，堅冰至」的道理。易屯卦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早辯就可以「知幾」，「知幾其神乎」。又如以得失吉凶為喻：此失彼得，彼失此得，「禍兮福所依，福兮禍所伏」。得失吉凶各有一方面，俗語云：「塞翁失馬，安知非福。」這也是物極必反的道理。再如以治亂為社會秩序之標準，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不也是一樣的道理麼？所以一切的事物，都是兩端在對立而求一致，互相的推動發展前進，這兩端完全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倘使固執其一端，則絕不能配合而為一個整體了。聖者善之對，誠者

美之對，無善即無惡，無美即無醜，猶之乎陰陽晝夜，非絕對的，孤立的，善惡美醜有定性而無定形，故可以隨時隨地為轉移，必須本其發展的歷程，以中庸之道作綜合的評判，才能有一種標準。一切相對的形容辭，都可作如是觀。應用此種原理，最要緊的，是把擱着兩端，而求其合，執持着中心，而求其分，所謂「執兩用中」的意思，就是中庸文化的最好注腳，無論「心」「物」交關，「心」「心」「心」交關，「物」「物」交關，都有其辯證的道理，而孔子以「時措之宜」一語，作為辯證法的中庸之用，（對中之體而言）所以「因時制宜因地制宜」，乃為辯證法中不可缺少之條件，孔子「極高明而道中庸」，孟子稱爲「聖之時」者也。中庸既爲整個的事物一體之中心，也是辯證法中的正題反題之合，不過黑格爾的辯證法是唯心的，馬克思的辯證法把它「頭腳倒置」過來，是唯物論的，又各執其一端，他們自身就違反了辯證的道理。因爲辯證的本身也是辯證的，何有於「心」「物」「體」「用」先後之可言？「心」和「物」也是一體的兩面，中庸的道理，乃以精神與物質並重，實在比他們更進一步。儒家講「內聖外王」，「有體有用」，「明德新民」「開物成務」「成己成物」都是相對的兩面，合而爲中庸之道的整體。因爲有物必有用，物爲體而用爲神，神又存乎質，神爲體而用爲用，譬如用手寫字，手是體而寫爲用，然必先有寫字之意識而後用手，則寫爲體而手又爲用了。若斷斷於「心」「物」頭腳之辯，又何異問雞和卵是那個先有的呢？

(III)

中庸文化的意義既明，則由此文化而反映出來的中國國民性，確實是偉大的。因爲中庸是相對主義，而非絕對主義，是全體綜合主義，而非一端固執主義，因爲是相對的，所以要人我各得其平，因爲是綜合的，所以要心物各得其所。人我欲得其平，則有「親親」「忠恕」之道，心物欲得其所，則有「利用」「厚生」之方。親親私也，忠恕公也，利用，所以「成己」，厚生所以「成物」，合成一體則爲禮，措之時宜則盡性。禮者理也，宇宙之法則，義者宜也，適當之行爲

，所以孔孟以禮義爲人生之大防，正是「正一反，合而爲中，一時一地」分而爲用的道理。中國國民性涵蘊於此種哲學之中，才表現出：（一）和平的（二）寬大的（三）知足的三種特質。爲什麼是和平的？因爲惟有和平才能求得合適的生活，「羅素說：『西文化的優點，是科學方法，中國文化的優點，是合理的生活觀念。人類之性，莫不求生，「食生惡死入之恆情」，萬物所以養人之生，既不可以物役人，尤不可以物害人，我之於人，人之於物，乃相對的。人類是宇宙整體之主宰者，絕不是「不共戴天」的仇讎。所以說：「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人為萬物之靈，亦爲萬物之一，其體爲物，其心爲靈，物爲天地之德，亦爲天地之神，（易言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其體爲質，其用爲神，所以說：「民吾同胞，物吾同與」。又說：「仁民而愛物」。以人我推之於人物，完全都是相對的生活着，必求其合理化，方能盡人之性，亦所以盡物之性。」「理」就是辯證法的中庸之道。欲求其合理的發展，則必須有仁愛的德性，中庸說：「自明誠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易經說：「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又說：「聖人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是解決人類問題——就是人生宇宙應該如何——的一種方法，這方法是訴之於德性的，而不是訴之於武力的。強權即公理，Might is Right，這句話，中國人從來未說過。孔子不舉軍隊而但陳豆（即禮）孟子反對戰爭而修談仁義。因此才形成了中國人愛和平非戰爭的國民性。倘使不得已而用兵，也要是「仁者之師」，「兵以義戰」。這從太王避狄遷岐的事跡，更可得一個充分的證明。太王說：「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這句話是中國文化的精髓，土地所以養人，爲爭土地而害人，從德性上說是講不通的。易經說：「天地之大德曰生。」孟子說：「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

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奔戰者服上刑。」中國人自來就反對戰爭，其見於詩歌者，如：

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風夢裏人。（陳陶《西行》）

澤國山河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憑君莫說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曹松《己亥歲二首》）

自古邊功緣底事，多緣髮髮欲封侯，不如直與黃金印，借取沙場萬歲頭。（劉牧《秋史》）

身屬燕姬一命輕，君看一騎向食生，無因喚取殺兵者，來此橋邊聽哭聲。（劉克莊詩）

以上都是以人性貪生惡死的意思，來反映出戰後遺棄遺孤之痛苦！推己及人，方為恕道。犧牲多數的生命變為骷髏，徒博封侯之賞，這豈是「上天好生」之德，人性「親親」之義？所以中國的歷史，都騷亂的批評窮兵黷武，都反對好大喜功，也是本於辯證哲學，使人類走到合理的途徑，萬不可老在「矛盾」鬥爭中求生活。」一切以人類永續的生活為對象，一切以合理的宇宙演化為目的，中國先哲看透了這一點才發明「順天承道」的中庸文化，才發成了和平非戰的中國國民性。

(四)

為什麼是寬大的呢？這完全是辯證的——中庸之道的作用。必須寬大方能成其和平。因為「廣大配天地」，「無不持載」，「無不覆載」，「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人是參天地之化育的，所以也應該「法象天地」，以寬大為德性。中國所以能成爲「泱泱大國」，所以能融合幾百個小民族而成爲一個大「中華民族」，完全是這種寬大的德性所生的結果。中國以往對待外人，是「遠人來服，則修文德以祿之」，用文化的力量來求其「和」；「合」，決不用武力來壓迫，以使之「屈服」。即令外人壓迫中國，中國人也是主張「以德懷之」，所謂「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試看漢武帝因為匈奴的壓迫，欲復「九世之仇」，用兵征伐，引起全國人

的反對，應徵論中賢良文學之言，可作代表了。所以中國從來沒有華嚴的民族主義，因此才能融合「四夷」，以成今日「五族共和」之局。古代的蠻夷戎狄，中古的五胡，近世的遼金元清，都可供例。至於歸向中國的各民族，中國人也從未用武力干涉它們的內政和教育，而用人力財力幫助它們發展，從前朝鮮安南緬甸暹羅等國都可爲例。朝鮮安南受感化最深，幾千年都是不使不叛之臣。不僅理論和事實如此，並且在理法上還有明文規定。曲禮說：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禮之禮，房室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

唐律疏議云：

「諸化外人自相犯者，各依其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之。」（這是中國法律的出入主義。）

俗出乎情，禮隨乎性，因其風不易其俗，治其人不變其法，中國禮法何等寬大？就理論上講這是人的德性，就事實上講這是一種善道。不求其變而自變，不強其化而自化，中國自古以來同化力非常強大，都是由於這套偉大的中庸哲學。世界歷史家對此都有所認識，而加以贊揚，日本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英國韋爾斯的世界史綱，讀者翻閱自知。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訓上說：

從來願大則量大，量大則爲大人，願小則量小，量小則爲小人。是以泰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辭細流，故能成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成其德，凡此皆量之爲。……堯舜的博施，何分此土彼土？禹稷襄糶，何分此民彼民？湯武伐桀紂，何分此國彼國？孔孟殆車馬，何分此邦彼邦？天下凡間，分背之則有萬國，統會之則爲一家。……何得存此疆界之私，何可起爾吞併之心，……在易「同人於野」則亨，量大之謂也。「同人於宗」則吝，量小之謂也。况量大則願大，而人亦易之俱大，量小則願小，人亦與之俱小。凡有血氣者，安可獨天德之和，而違非底徒之覆哉？詩云：

上帝原來是老親，水源木本念尊真。

貴者與賤者同歸，心好天人亦何人。

獸畜相殘，不義，鄉鄰互殺，斷非仁。

天生天養，和為貴，各自相安，享太平。

這首詩充分的表現出中庸的人生哲學之出發點，是由於「量大小」的和平之禍。所以「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徠之」，「既來之，則安之」了。倘使中國人不修寬大之德，而一如羅馬帝國之征服歐洲各邦，壓迫榨削，則中國的命運決不能延長到今天？中國也決不能統一在二千年以前。必然要和羅馬帝國衰亡後歐洲諸國的分裂狀態一樣。因為羅馬的帝國主義是「遠人不服，則用武力以壓之，既屈之，必反之。」這也是必然的結果。其理由仍然是辯證的。易經以「高明配天，廣厚配地」，「高明喻和平之道，廣厚喻寬大之德」，「人與天地參」，「所以中庸說：『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這是中國的第二種國民性。

(五)

第三種是知足。知足的意義，頗費解釋，尤其是對於西洋的朋友說。因為近代西洋的經濟事業之發達，由於英國經濟學鼻祖亞丹斯密的獎勵慾望。知足恰恰是使人知道慾望的界限。老子說：「知足不辱，知恥不殆。」俗語說：「知足者常樂，能忍者自安。」人的慾望是無窮盡的，有慾望然後求滿足慾望之發展，所以它是一切事業的原動力。世界進化，大都由於此種原動力，這是不錯的。然而「天」「地」「人」是宇宙間三大要素，必須天地人三「道」相參而求其「和」，也就是使「心」「物」各得其所。易言：「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說：「滿招損，謙受益」。謙字的意思，一方面要「若虛」，一方面要「知足」。若虛則必求「進」，知足則必求「止」，進是動，止是靜，然而進止動靜都是相對的，進是止之連續，止是進之存在形態，動是靜之連續，靜是動之存在形態，這也是黑格兒辯證哲學與新變化的基本道理。大學說：「知止而後有

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合此，定，靜，安，慮，得為一體，就是「知足」。知足的意義並不是滿足，而是要知道連續存在之理，以求其對立之一致。所以謙字包括積極和消極兩義，謙而若虛，始能容物而成廣大之量，謙而知足，始能用道而成仁愛之德。因為宇宙間萬物演化而不滅，「進」「退」「虛」「消」「長」都是相對的。人類可以順乎物之性而利用之，不能違乎物之性而改變之，所謂「征服自然」的意思，只是征服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既然是駕馭它，利用它，必須要愛惜他，培養它，萬不可踐踏它，勉強它。譬如一羣馬，你駕馭它，利用它，牠連代步都可以，但不願使它奔馳無繮，否則必傷而斃矣。孟子有個苗助長的一段故事，說農人力可以培養苗秀花榮果實，但人力不能使苗花果不循自然之規律而突然長成，個苗助長的結果，是「其速斃者其速速」，根據物理學的原則，事物的發展愈快，則其毀滅也愈速。知足就是循物性而限制物慾使物的發展和人的德性配合而得其平衡，不以人力而戕賊物性也不可以物力而擯毀人生。所以說「要愛惜物力，不要「暴殄天物」，所以說：「玩物喪志，不要「身為物役」。生活上的物質條件，中國人只求「苟完」「苟美」，不求「盡善」「盡美」，惟獨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道，則必「止於至善」。孔子稱贊顏回好學說：「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原來的原質，捉襟肘見，而自謂「貧也非病也」。陶淵明亦以「安貧樂道」自解。這是一種安貧樂道的精神，完全是知足哲學培養出來的，因為人慾無藝，不可使之「橫流」，橫流之禍，必至於「率獸食人」。物的發展有限，不可使之過度，過度的結果，必至埋沒了人性，目前的歐洲社會和世界戰爭，不是一個純粹的例證麼？物的發展太快，而人的德性不能與之配合，人反變為物所奴隸，所謂科學文明者，不過為人類多添些殘殺的利實和工具而已。此以往，荷無善策以改變世界文化之素質，則侵略者仍是侵略者，暴保不於若干年後再出發個魔王，和無數的惡鬼？中國數千年來「此

如山」，平緩舒徐的進展，不像西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急劇變化，全憑此「知足」二字為之限制物慾，使心物各得其所，以免「過猶不及」之弊。中國人適鑒於此種哲學之中，其特性是要「君子固窮」，不然則「小人窮斯濫矣」。固窮不是終窮，乃是守窮，守窮以待其「通」，而不強求其通，強求則不免濫了。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這完全是教人限制私慾，循中庸辯證之大道和理則，以達到窮通之變化和人我人物相對的發展之平衡狀態。否則，人慾不免於「橫流」，而一切都可以「無所不為」了。物質的生活，不是說沒有一點兒標準，而大慾的滿足則可以說毫無一定的標準，粗服土羹和錦衣玉食，同樣的感覺着不滿足，俗語說：「得寸進尺」，「得隄望蜀」。

中國先哲對於這個問題以知足作為無窮慾望的限度，實在也是由於辯證的哲學而來的。因為「百尺竿上更進一步」，原是應該的，然而「登高欲墜」，就是俗語所說：「爬得高，跌得重」，也逃不出「物極必反」的道理呵！晉書諸葛長民傳：「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李斯將敗，欲牽上蔡黃犬，陸機臨刑，願聞華亭鶴唳，居高欲顛，應當安不忘危，富貴貧賤，必須各有其通，孔子說：「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中國先哲，常教人「安固守常」，「持盈保泰」，為得是循序發展，懸延永久而漸變，不致急劇加速而突變。然後才能够「高而不危，安而不傾」。俗語說：

人騎馬，我騎驢，驢驢不如騎馬的！回頭又看推車漢，比不上不足下有餘。

這是中國人的知足特性之絕好的寫照。假如不這樣的思想，驢驢的定要騎馬，推車子的定要騎驢，勢必「取而代」之，不免就爭奪起來了。孟子說：萬乘之國，執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執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慝。也是一樣的道理。社會怎樣能維持而不亂呢？中國人既以知足樂道為精神，所以纔能養成勤勞節儉忍耐和適應環境的國民性。克勤克儉，生生不息，樂天知命，無怨無尤。黑格兒說：「中國人的特性，自視為最卑賤，只有一種順服聽命的意識。」（見歷史哲

學）明恩溥 Arthur Henke von Sailer 說：中國人的特性是「活易死難」，「沒有神經」，「耐性太好」，「不求準確」，「不重主義」，「勤勞」，「持節」，「知足常樂」，「有私無公」，「無惻隱之心」，「言而無信」，「爾詐我虞」，「愛面子」，「輪轉」，「吝嗇」共十五種，（見中國人之特性 Character Characteristics，都是表面上膚淺的觀察，殊不知一切的特性，都是由於中庸文化發生出來的，一切的習俗，都由於和平寬大知足的特性養成的。

（六）

以上所述三種國民性，仍有它一貫的道理，和平，寬大，知足，各有其連環性，各為對立的一致之和。其理論也是辯證的。以中庸為其核心，以儒行（禮記有儒行篇）為其骨幹，這是孔學的全貌。顧憲成說：「學問須從狂狷起腳，然後能從中行歇腳，近日之好為中行而每每墜入鄉愿窠臼者，只因起脚時便要歇脚事也」。所以我在本文開頭講中庸文化時，就以狂狷為說明事物對立之兩端，求其一致，則為中庸，俗語所謂「百鍊鋼化為繞指柔」，乃儒家學說之絕好解喻。此即是剛柔互濟之理，亦記亦柔，絕非半剛半柔，亦狂亦狷，絕非半狂半狷，這就是所謂有體有用之學。不過體和用也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若中庸之精詳而有系統，乃係儒行之體，若儒行之剛毅而不侈靡，乃係中庸之用。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如何能使文質彬彬呢？則必須剛柔互濟，文質並重。方能達到理想的中庸之境界。就拿和平寬大知足三種德性來說吧：和平是文武合一的，孔子不語「戰」與「力」，然而稱道管仲攘夷之功，又教人「執干戈以衛社稷」。孟子述太王避狄之仁，又說「國君世守社稷，效死弗去」之義。曾子也說：「戰陣無勇非孝也」。這又是什麼道理呢？蓋「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文而曰事，是積極的，武而曰備，是消極的，這完全是剛柔相濟之理，（致中和）目的手段之分。（體與用）「文可長用，武難久行」，這是中庸之體，「殺身成仁，捨生取義」，這是儒行之用。所以「和」之中有仁柔，也有剛健，

「平」之中有「定分」，也有「定力」。充文充武，亦剛亦柔，這纔能達到真正的和平的目的。寬大也是「人」與「我」合一的，「不顧人以從我」也「不顧己以從人」，「書經臯陶說：『寬而栗，柔而立』

外人內地雜居與國民風習

余家菊

英美平等新約訂立，戰後我國自能躋於強國之林，與列國平等相處。按新約，我國民與外人可雜居於對方國內，而分別接受對方之法律管治，並得在對方國內購置產業經營實業。其所及於我國之經濟影響予別有文論之，茲試從社會生活上一為論測。

各國國民雜居我內地，雖所屬國籍不一，要以英美蘇諸國僑民為重要，我國民風俗習慣既與諸國殊，能了解對方語言，進與國際慣例者，亦復不多，隔閡之起既屬難免，誤會之起，亦在意中，故宜妥慎講求預防之法，以期遠人有賓至如歸之樂，我國民亦能收觀摩砥礪之益。

外人以風習之殊信仰之異其來我國，勢必集團聚居，又加以自治力強，組織力大，其聚居之處，殊採自謀保衛，自籌福利，更加以經濟力充裕，所為不難如其意以實現，以我國民之生活情況持與相較，恐不免相形見絀，而使人起民族有優劣之謬見。若不幸而果然，所予我國民精神打擊，殊為嚴重。此實有待於內政上與教育上之加緊努力者也。倘戰後猶有野心國存在，利用雜居之權，實行間諜網布置，更從事中外感情之挑撥，內地各民族向心力之離間，則問題更為棘手。

試觀上海，西人住區，與華人住區，迥然隔絕。即如鶴公山避暑地西人與華人亦各自成區，則今後西人分區聚居，始屬必然。加以內地人知識不充，民風無禮，地方人士種種措置，難滿西人之意。僑居西民勢必經由其領事機關與我上級行政機關交涉以實現其自身之意志。最終決定，無論是否公平，此種方式，終將使國人誤會西僑假官府以欺壓人民，三十年前民間流行「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

，「寬則容衆」，所以子張說：『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他批評子夏說的「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是不對的。（未完）

之謠辭，切宜防止其復活。至於西人富有殖民經驗殖民地習氣，亦與其本國風俗有殊，其遠來中國者雖多志行高潔之士，而以發財為目的強暴為手段者，亦不能預斷其必無。宜妥為防範杜漸之計。

西人與我國民間，易起衝突者，又有宗教問題。我國自輸入科學以來，所有迷信，漸歸掃除，一切宗教，不分高低概日為迷信者，其人不在少數。反動之初事態常然，要無足怪。惟是至今復有新知識者，對宗教類持左袒之見，則仍為一確然之事實。蔡子民先生但以美育代宗教之說，其影響迄未消泯。以美育代宗教，本屬法國新派人士之企圖，法國美育誠甚發達，法國是否做到代宗教以美育，吾不敢言，惟法國人之輕鬆喜強烈刺激，是否與以美育代宗教之運動有關，吾亦不能無疑。惟美感為恬愉宗教之感為虔敬，二者殊未可以相代。且虔敬之感使人知所檢束敬覺，不敢負天，不敢因循，其用亦不可輕，似亦不應予以消滅。在知識份子對於此種觀念未有演變之前，對西人之宗教觀念，難期衷心尊重。

民間對西人宗教觀念，過去曾起反抗。竊嘗考其原由，益非盡出於淺薄的排外思想。昔日我一般人民，多數崇拜孔子。孔子雖非教主，實亦一有宗教觀念之人。如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如曰：祭神如神在。在之義為祭。神能察人，神能因禍而赦人之罪，是為宗教觀念無疑。祇以孔子重自立自成，故此一方面之教誨不甚顯要。但後來為孔子學者，並不見有多人根本持無神論。反對佛教者，多藉重其因果報應之說，蓋因果報應之說，與盡其責不求其報之精神，即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者扞格不入故也。崇拜孔子者與基督徒相齟齬，則以盡

吾徒之漢視祭祖故。儒家蓋視祭祖，意在使人勿忘其所自出，因以篤厚人間之情誼，所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者是也。人與人間，情誼澆薄，愛人如己之教，固無所施也。中國民間之重孝父母，基督徒固亦教人孝父母，但其說有易使人誤會者，如耶穌說遺時，其母至，人告耶穌曰：君之母來。耶穌曰：孰為吾母？願從上帝者吾乃母之。一大意如此。想未檢原文，夫正禮重於骨肉，自屬真理。春秋之義於父子君臣間亦有「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之說，然而基督此語實足與人以衝激，而使人不暇復思顧起反感。

中國民間信仰佛法者甚眾。佛法重佛像，抽象義理，難於把握，皆整理於形像中，則整理之教易收其效，乃人心自然之理，基督徒反對崇拜偶像，或因基督教發生地帶之偶像崇拜，所拜偶像，無崇高意識，故使徒立此一說。嗣後傳教師傳教東來，見佛徒形像，亦復偶像視之，是否為一適當態度，吾人殊難置論。至於我國正典，祭祀，如

加強法幣

自從田賦征收貨物以來，法幣在財政上已經不是唯一的工具。但是法幣的重要性，並不因而減少許多。在抗戰建國的經濟系統中，他仍舊是處理一切經濟事項上的一個主要工具。一切的人力物力，大部分仍舊要通過工具來支配。這是很方便一個好工具。無論為抗戰計或建國計，我們都有愛惜這個工具的必要。我們不但應該維持他，而且應當加強他。

在蘇俄的革命過程中，他們曾有一個時期想毀棄他們的法幣，紙幣布。但是不久，他們發現他們原來的主張是錯了。他們又回頭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恢復他們的紙幣。這個新政策是對的。果然在他們後來三五年計劃的執行中，他們的紙幣給予他們執行上不少的便利。現在蘇聯的國民中再也沒有主張毀棄他們的紙幣的。蘇聯過去的經濟是如此的。可以作我們的借鑒。所以維持法幣的主張。無論在「舊」

帝王廟，孔子廟，各姓宗祠，皆用「主」而不用象，曾在正典祭祀之列而造形像者有闕廟等，其發生係受佛教影響。

總之宗教的隔閡這為一大問題。一面當教國民恪守信教自由，對各教為平等的尊重，一面期望各教人虛心體察對方的信仰，凡不可不聽其衝突者，皆設法消融之。中國從無宗教紛爭。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望來華各教皆能乘此闢建精神。

外人內地雜居，在中國史上，歷來視為重大問題。因准許雜居，則望其相安，不能相安，則雜居足以遺禍無窮。吾人觀中重細則各族時起紛爭，印度境內各教時起衝突，吾人思慮預防，對身為國民者，則望其恪守國家至上之義，而無所歧視於族與教之間；對於僑居外人，則望與我國民同抱互求了解之心，以共達安居樂業之目的。無論在事實上或精神上，皆以互尊之心，行砥礪之實，以共求進步。如是之謂平等相處。

衛挺生

新「頭腦」中，都是認爲對的。進一步來主張加強法幣，也決不會有人從理論上認爲不該的。

理論上既然應該維持而且加強法幣，實際上也並非沒有辦法。不過，可是有一個先決問題。我們要問，政治當局與全國人民是否下決心。若決心目前忍痛就有辦法不決心目前忍痛就沒有有效的辦法。

假定大家決心要忍痛，來維持而且加強這個很方便的經濟工具——法幣。那末我們第一個請求：就是抗戰建國的財政責任，我們國民全體應當擔負了當的擔負起來；不要再想什麼點石成金的法幣，解除國民應當擔負的財政責任。

財政上的點石成金的法幣，就是紙幣的印刷。這個法幣的妙處：在於國民人人覺得他是對於自己無損有益的，樂得袖手旁觀。可是實際上人人不知不覺中，都受有損失，祇便宜了極少數的幾個機關。

財的人。他們才真正受益。而一般人旁觀的結果，竟如神話與上的寶票，被法幣給拍決完了，還不知道，社會一般人的貨幣收入並不減少，甚或大大的加多，而實物收入已經減少到幾十分之一了。這是這法幣的妙處，而其不妙處亦即在此。

假使大家老老實實的肯担負抗戰建國的財政與經濟的責任。這個問題比較簡單。政府可以按照各人的能力，課以應有的責任。富者多負，貧者少負。強者多負，弱者少負。有錢的多出錢，有力的多出力。大家苦樂均勻，一切合理，自然不須再用法幣，使大家同受無名損失，而尤其貧者弱者，可以不須担負過分的重任了。

假如大家肯目前忍痛來維持而加強法幣，這問題的解決極簡單。第一步要使法幣的增發變為不必要。第二步要使法幣一部份回籠。如果能使紙幣發行以外的其他財政收入，足敷抗戰支出；則增發即變為不必要。如果超過支出也當然就回籠。

前節所云「其他財政收入」並不須另覓途徑。政府已備的途徑有課稅，征實，專賣，徵借規費及發行公債，都是正常途徑。已往的錯誤，並不是途徑的錯誤，而是數量的錯誤。因為數量不夠。所以沒有發生平衡的效果。紙須從數量上去求足給。

羊毛總須出自羊身上，這是一個永遠不變的原則。我們的盟國英美全國人民歲入百分之五六十以上已經供獻給國家了。我們的被關德

日全國人民歲入百分之七八十已經貢獻給國家了。我們如果還想以什一而稅為限，以平時的標準希望政府課稅，那末政府除了繼續用金幣來對付我們，是無路可走的。而點金術的實施，我們並無絲毫的便宜。我們與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我們目前應從財政上經濟上加強慷慨的犧牲。

我們政府應備已有的正途途徑擴而充之——課稅也，征實也，專賣也，徵借也，說說也，發行公債也，加大數量，擴大範圍，務求儘其收入足敷抗戰支出而能平衡預算為止，務達到國民收入大部份充實國家為止，務使國民除合理的生活外無過多剩餘為止。

如果財政收支平衡，雖收入不超過支出，法幣亦能回籠。因為紙幣既不增發行，人民恐懼心理逐漸安定。國幣而無奇可居，且有極大之可能。則向來不肯存款於銀行者，逐漸將存款於銀行。銀行存款增多紙幣也自然回籠了。政府再加嚴格取締，使銀行存款均用在生產上，使物的供給加多，物價趨平，法幣也就加強了。如果更進而使人民日用必需品也有一大部歸政府控制，而發生平準作用；則物價更完全在政府的掌握中。限價的控制物價，為政治的控制。把物價的平準物價，為經濟的控制。政治的控制，需要政治組織健全始能收效。經濟的控制，使政治不健全亦能收效。有效的政治或經濟控制，法幣也可加強。

坐井觀天錄

三四分法

有人把同盟國分成四等：「第一等在計劃勝利，第二等在爭取勝利，第三等在等待勝利，第四等在等候勝利」。

上月二十九日，國聯同志會和國聯外交協會等在中華總商會歡迎英美軍事代表團長龍式姆將軍，吳秘書長擔任主席，與羅斯福，陸榮廷不認為妙語解嘲，於是渝市龍門陣中，到處有人傳述此話。

劉英士

有人以為計劃勝利者結果必能爭取勝利，在談勝利者其勢必將獲勝利，所以上述分類無嫌過細，不妨打一對折。

或以為計劃勝利的國家，往往胸有成竹，不慌不忙，至少從國際上看來，它的初期行動也似等候勝利。以此，我們對於等候勝利的國家，似亦不便斷定其非有所計劃。果爾則原分類法所排次序，也許沒有什麼意義。

更有人以為同盟國家真不注重宣傳，宣傳之重心雖各有偏，海峽

勝利尚未獲得以前，其為空談則一。所以空談勝利一類，不能獨立。歐戰記云：「漢地有世間呪禁法，能發神驗，除災厲」。空談勝利也許就是所謂「世間呪禁法」之摩登持員，苟能「發神驗，除災厲」，則亦不失其為爭取勝利的精神戰術。現代交戰國家既有所謂「精神動員」，自然應該採用精神戰術。照此說法則空談勝利也不一定是種過失，相反地，它或可表奇蹟。

無論如何，前述分類總可傳達，因為這不傷害任何盟邦的情感。

四 兩種廣告

有位外國朋友來華既久，略識之無，近來學習看報。他是一個商人，並不注意社論，却愛翻閱廣告。昨天他對我說：「中國報紙上有兩種廣告，最為習見，但在外國報紙上是沒有的。」

「那兩種？」

「結婚啟事和某律師受任某女士常年法律顧問啟事」。報告讀者，我的運氣還算不錯，我們的談話不過至此而止。倘使對方不很識相，定要追問理由，那末，任何自尊的中華兒女，斷然不便直告之。「王顧左右而言他」，也許是種最為適當的政策。

倘使對方問你，「中國人結起婚來，為什麼要發大紅帖子？」你的答覆很容易，因為這是喜事，根據傳統習慣應如此。

倘使對方問你，「中國人的結婚典禮，為什麼像演文明新戲？」你的答覆也很容易，因依民法第九百八十二條之規定，結婚應有公開之儀式，而除市民大會以外，再沒有比演唱文明新戲更公開的。

倘使對方問你，「新郎既穿長袍馬褂，新娘為什麼還要披頭紗？」你的答覆更能使他滿意，因為是中西合璧，新舊貫串。

倘有結婚啟事一項，隨你如何解釋，總不能使對方認為圓滿。說是為了招攬賀禮吧，有許多啟事上說，「國難期間，一切從簡」，而且有的根本未將結婚地址登出。說是為了親友疏散，住址不明，與其發帖而有所遺漏，不如登報以明普及焉，這在人情世故上看來，辦法也不壞點。這年頭兒孝子尚不丁憂，照常就職視事，結婚小事，何必隆重至此？而且未接請帖的親友，苟非發了橫財，也不

寬恕你這啟事。說是為了獨身多年，孤苦已極，一旦得享雙宿雙飛之樂，乃難得意忘形，而發一種難相的「捷報」吧，這更不成話說。須知真正得意的情場高手，如司馬相如之流，決不再登結婚啟事。說是為了物價昂貴，請客太過浪費，乃於擇吉開張之際，不得已而登一個事後通知式的啟事，使人知道船已下水，毋庸來攔查禮吧，這也沒有充分的理由，因為結婚根本上是兩個人的私事，只要他們各無外遇，誰不會來管這閒事。

有位讀過杜威博士所著「思維術」的空閒學者，為了研究所以要登結婚啟事的理由，據說曾擬立了一百零一種的「假設」，而後逐一加以推演，結果未能算成報告。

我想起了一段故事。有位吃慣粵菜的朋友，走到徽館裏去點了一隻紅燒大魚頭，堂倌立刻糾正他說，「這裏不做大三元。徽州人做菜是有頭有尾的。改點頭尾如何？」大概結婚啟事是頭，離婚啟事是尾，根據有頭有尾這一原則，我們的報紙上既常登載離婚啟事，自應配以數量相當的結婚啟事，是不是？

請到某律師受任某女士常年法律顧問啟事，情節似更離奇，不易捉摸。幸虧我不想去侵害某女士的法益，故也不怕某律師靈武法保障之職，相應置之不理可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一日初版

當代論壇

第二期

每冊定價三元

主編者 劉光炎

編輯者 吳方仁 趙鍾簡

發行者 聯合文化編譯社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重慶李子壩
三江村四百號